

**CRITIQUES and DIALOGUES
on MODERNITY**



现代性批判及其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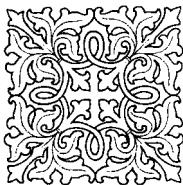
马克思与韦伯、福柯、
哈贝马斯等思想的比较

陈志刚◎著



社会 科学 文献 出版 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CRITIQUES and DIALOGUES
on MODERNITY**



现代性批判及其对话

马克思与韦伯、福柯、
哈贝马斯等思想的比较

陈志刚◎著



社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批判及其对话：马克思与韦伯、福柯、哈贝马斯等思想的比较/陈志刚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1
ISBN 978 - 7 - 5097 - 3944 - 0

I. ①现… II. ①陈…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 - 研究
IV. ①B0 -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2242 号

现代性批判及其对话

——马克思与韦伯、福柯、哈贝马斯等思想的比较

著 者 / 陈志刚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责 任 部 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004

责 任 编 辑 / 刘 娟 曲建文

电 子 信 箱 / bianyibu@ ssap. cn

责 任 校 对 / 白秀君 白桂和

项 目 统 筹 / 祝得彬

责 任 印 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 者 服 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印 张 / 21.75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 393 千字

版 次 /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3944 - 0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导 论	1
一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出场	1
二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遮蔽及其当代对话	4
第一章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逻辑演变	6
一 理性主义基础上的现代性追求	6
二 人本学基础上的现代性批判	19
三 异化劳动和物质生产基础上的现代性批判	34
四 科学实践观基础上的现代性批判	50
五 小结	70
第二章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	73
一 现代性的制度维度	73
二 现代性的矛盾和超越	91
三 不发达国家的遭遇和现代性的多样性探索	107
第三章 韦伯：理性化与现代性	122
一 理性化及其诸种表现	123
二 理性化的悖论：意义和自由的丧失	131
三 现代性冲突的解决：超凡魅力	137
四 韦伯与马克思思想的比较	147

第四章 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现代性批判理论	182
一 对工具理性的独特批判	183
二 对压抑性社会的拯救和超越	196
三 批判理论与马克思思想的比较	205
第五章 福柯：现代规训社会及其批判	212
一 规训的现代性	213
二 走向主体化	239
三 权力和资本视阈中的现代性批判：福柯与马克思的思想比较	257
第六章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和现代性的重建	281
一 以主体间性为中心的交往理性	282
二 理性化和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291
三 交往理论的得失及其对马克思的挑战	299
结语	316
一 马克思主义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316
二 研究时代新问题，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	317
三 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及挑战	322
参考文献	325
索引	335
后记	338

导 论

—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出场

现代性是社会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一个最具争议的问题。现代性从何时开始，“在具体的日期上根本没有一致的看法”，而且“这一概念充满着意义的不确定性”，“所指的内涵不清，外延不明”。^① 也许正是这些不确定因素，增加了学者们研究现代性的兴趣。

英国著名学者吉登斯曾指出：“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社会的缩略语。”^② 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现代性”概念，但他一直关注、解剖、批判现代社会^③，明确强调“‘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④。因此，马克思关于现代资本主义批判和现代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就是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思想。很多学者都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对现代社会解剖的辉煌巨著，包含着丰富的现代性思想，甚至在他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也可以预见到现代性观念。^⑤ 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可以说“是对现代性的一种高度现代的解说”^⑥。正因此，吉登斯把马克思和韦伯、涂尔干并称为三大古典现代性

① [英]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邵迎生译，商务印书馆，2003，第6~7页。

② [英]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尹宏毅译，新华出版社，2001，第69页。

③ 在谈到《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关于“现代社会”的提法时，列宁颇有兴趣地问道：“既然马克思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谈论一般社会，为什么马克思却说‘现代（modern）’社会呢？他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现代’一词，按什么标志来特别划出这个现代社会呢？”（《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44页。

⑤ Derek Sayer. *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An Excursus on Marx and Weber*,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91, p. 9.

⑥ [英]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高湘、冯玲译，商务印书馆，2004，第28页。

理论的代表。

从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的两面性就为人们所认识，对现代性的批判就已经开始。有学者认为，也许第一个提出今天意义上的现代性概念的是法国哲学家卢梭。^① 黑格尔虽然不是第一位现代性哲学家，但“黑格尔是第一位清楚地阐释现代概念的哲学家”，“是使现代脱离外在于它的历史的规范影响这个过程并升格为哲学问题的第一人”。^② 但相比卢梭、黑格尔，“马克思或许是早期现代性——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最出色的社会分析家”^③。因为虽然资本主义可以追溯到 15 世纪，但作为历史转折点的机器大工业，“它的起源最早也不会早于 18 世纪晚期，而且即使在那一时期，也只是在英国的部分地方零星出现”^④。机器大工业只是到了 19 世纪才有了强劲的发展。而现代国家的出现，也是在 19 世纪中期以后的事。所以，对于这些重要的变革，尤其是对于机器大工业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无论是卢梭（1727 ~ 1778），还是黑格尔（1770 ~ 1831），显然都没有马克思（1818 ~ 1883）认识得这么清楚。深刻表现资本主义病症的经济危机，第一次发生于 1825 年，此后大约每隔 10 年爆发一次，在 1837 年、1847 年、1857 年、1866 年、1872 年、1882 年、1890 年、1900 年都程度不同地爆发了经济危机。所以，相比卢梭、黑格尔，马克思无疑见证了更多的经济危机，也有更深刻的认识。正因为危机不断地爆发，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也是无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从整体上说，对早期资本主义现代性，无论是成就还是病症，马克思都有机会进行观察和体验，并因此可以作出最出色的分析。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不仅分析了其病症，还指出了其病根，开出了处方。有别于卢梭式的经验描述和黑格尔式的思辨推证，马克思抓住了资本这一关键，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把握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并注重从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运动的角度探讨了现代性特征。^⑤ 对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使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比其前辈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刻性。“马克思可以说是对现代性发难的始作俑者。他对现代欧洲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原则作了批判，指出它们来源于现代经济的本性——资本主义。马克思是理解了——在这方面许多当

① 周宪：《现代性问题史》，《长江学术》2003 年第 4 期。

② [德] 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04，第 5、19 页。

③ [加] 大卫·莱昂：《后现代性》，郭为桂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第 41 页。

④ [英] 安东尼·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郭忠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第 10 ~ 11 页。

⑤ 周宪：《现代性问题史》，《长江学术》2003 年第 4 期。

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却不甚了了——资本主义具有永远都既是压迫力量又是解放力量这种根深蒂固的矛盾的本性的第一人。后来，这一点变成了辩证的现代性理论的核心信条。”^①

20世纪是资本主义危机发展到顶峰的时代，也是科学理性、技术理性大发展的时代。一方面，在短短几十年内，就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所谓的文明、民主、理性的国家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另一方面，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空间技术等的发展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使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把人类带进了后工业社会的新时代，推动了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疑极大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弊端，引发了以施宾格勒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西方现代性的新一轮的批判。然而，随着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对现代性的冷静反思批判又一度陷入了低谷和停滞，相反，“社会主义终结”之声一度甚嚣尘上，新自由主义横扫全球，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各国产生广泛的影响。

然而，新自由主义似乎并没有带来福音。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掠夺性制度，它不仅对内掠夺本国劳动人民，而且对外掠夺不发达国家。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推行，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其原因并非晦涩难懂的“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或全球化，而正是新自由主义所推动的制度与规范的变化。^②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也自此以后持续扩大。而且，无论是新自由主义的明星学生阿根廷、捷克，还是俄罗斯这样稍微有些不守规矩的学生，都有不佳的记录。在20世纪，“华盛顿共识”的推行使拉丁美洲“被耽误了十年”。随后，越来越大的危机发生了，先是墨西哥金融危机，此后是东南亚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波及范围更大的金融危机。然而，不仅是金融危机，政治危机也接踵而至。在人类刚刚迈入21世纪的第一个年头，正当美国到处高呼新自由主义、推行其文化霸权之时，在其本土却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9·11”恐怖袭击事件。“9·11”是对西方文化的一个严重警告。^③ 这一事件表明，强行推行西方民主、压制别国文化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且势必激起民族矛盾。到了2008年，连美国也发生了金融危机，而且这场危机对全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① [美]劳伦斯·E·卡洪：《现代性的困境——哲学、文化和反文化》，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2008，第18页。

^② [美]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刘波译，中信出版社，2008，第100~115页。

^③ 费孝通：《费孝通在200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159~160页。

许多国家至今仍未走出其阴影，一些国家甚至处于破产的边缘。美国的金融危机打破了新自由主义的神话和美梦，也宣告了照搬新自由主义教条、走美国模式的破产，彻底动摇了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探索一种超越新自由主义的新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上升为清晰的社会意识和政治价值。^①同样，美国的金融危机不但引起了反思、质疑、超越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也引起了重新审视和评估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中国模式的浪潮。

另外，21世纪以来，全球环境问题和资源危机日趋严重，这些问题也引起了我们的深刻反思，并把矛头指向了现代性。正因此，重新挖掘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为我们深刻认识当前社会中的各种危机及其根源，并找到解决这些危机的根本出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遮蔽及其当代对话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当社会实践急切地呼唤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时，它却遭到了三次重大的历史遮蔽。^②

第一次重大的遮蔽是马克斯·韦伯以其“文化学”框架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作了颠倒，试图从文化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学进行论证，并阐述其合理性。韦伯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不衰竭。当然，韦伯的思想十分复杂，而且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他的“文化学”框架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并不是简单的“颠倒”关系。二者在很多方面既有相通之处，又有相异之处。

第二次遮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从右和左两方面曲解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韦伯的社会学说拜冷战之赐被公认为最能够和马克思主义相抗衡的思想力量。”^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帕森斯、贝拉（R. Bellah）、麦克里兰（D. McClelland）和艾森斯塔特（S. N. Eisenstadt）等美国学者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与现代化研究结合起来，他们不是把新教伦理当作刺激现代化的因子，透过文化比较去寻求非西方社会的“功能对等项”，便是假定新教伦理和个人之“成就动机”有关，进而以量表测验各文化在人格素质上的差异，并用来解释

① 汪晖：《中国崛起的经验及其面临的挑战》，《文化纵横》2010年第2期。

② 任平：《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与当代中国新现代性建构》，《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③ 顾忠华：《韦伯学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23页。

现代化程度的高低，由此形成了所谓的“现代化理论”^①。这些“现代化理论”强调发展的阶段性，认为社会是一个不断进化的有机体，它要经过一系列有秩序的、不可逾越的阶段，而且每一个阶段总是比前一个阶段来得进步。西方工业发展的历史不再被看成韦伯当初认为的那种只有在西方才能产生的现象。^② 新兴国家只要沿着西方的步伐，就可以实现现代化，摆脱贫穷、确立民主。这种现代化理论，由于主张自然进化论，反对新兴国家通过革命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的变革，这就提出了一条不同于马克思以革命方式推翻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依附论则认为，国家落后的主要根源不是什么“传统状态”，而是受西方的剥削，对其依附。因此认为，只有真正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经济，而不是模仿西方现代化模式、依靠恩赐才能够获得发展。从而，从左边否定了马克思的现代性视阈，看不到现代性所导致的世界历史的必然性。

第三次遮蔽是，一些后现代理论家，如丹尼尔·贝尔、福柯、德里达、哈桑、利奥塔等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揭露和批判，逼迫包括马克思现代性话语在内的所有现代性话语的当代退场。与此同时，德里达、詹姆逊、齐泽克、德里克、鲍德里亚等所谓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到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以后现代视阈重新解读马克思，发现马克思的“后现代”本性，继承所谓马克思“后现代遗产”，构筑了一个后现代的马克思形象。对马克思的现代性视阈的三大历史遮蔽，即便没有完全遮没，也使得马克思与现代性关系在当代的碎片化、零散化、边缘化。

关于“现代化理论”和“依附论”，因为其思想内容相对比较简单，他们和马克思可以比较的地方不多，在实践中也遭到很多批判，很多学者早有研究，在本书中不作讨论。

本书拟围绕现代性的病症、超越的路径、现代性的动力、宗教、意识形态、资本和权力的关系、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进行正本清源，深刻挖掘和阐发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并对马克思与韦伯、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理论家、福柯、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批判思想进行比较分析。这些现代性理论家与马克思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他们的思想至今在社会科学中仍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希望，通过比较分析双方思想的异同，首先揭开它们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种种遮蔽，其次分析这些现代性理论的特色和积极之处，最后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对它们针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提出的挑战、责难进行回应。

^① 顾忠华：《韦伯学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24页。

^② [英]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陈一筠译，华夏出版社，1987，第32页。

第一章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逻辑演变

与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相类似，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也有一个演变历程。随着其逻辑基础的演变，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也不断变化发展，其逻辑基础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理性主义转变到人本主义，再转变到异化劳动和“粗糙的物质生产”，最后转变到物质生产实践的过程。大致说来，这个过程也是从接受康德、费希特到转向黑格尔，再到超越黑格尔转向费尔巴哈，并最终超越费尔巴哈，成为“真正的”马克思的过程。

一 理性主义基础上的现代性追求

在马克思的青年时期，即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在政治上仍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向往自由、立志献身人类幸福的马克思对德国社会的落后、分裂现状满怀激愤，渴望变革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用理性改变现实，建立自由、平等、民主的现代制度。为了批判现实，马克思开始选择了康德、费希特哲学，此后转向了黑格尔理性主义。

（一）转向黑格尔理性主义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马克思在 1836 年转入柏林大学后，其思想一开始受到康德、费希特哲学的影响。

现代性所崇尚的自由、平等、民主观念，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康德作为启蒙哲学的杰出代表之一，试图树立“理性”的大旗，对旧有的哲学、宗教和文化进行全面的批判。著名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甚至认为：“‘康德’，这个名字（它不是唯一的名字）标志着现代性的序幕与终曲，而且作为现代性的终曲，它也是后现代性的序幕。”^①当然，现代性的观念在康德

^① [法]利奥塔：《历史的符号》，汪民安等主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第 285 页。

那里并没有终结，费希特、黑格尔等都在推进，所以康德哲学不过是揭开了现代性的序曲。“康德从理性自身的视觉出发，对理性展开批判；所谓理性自身的视觉，就是说，理性用一种严格的话语方式对自身进行限定。”^① 在反思理性的能力基础上，康德明确指出：“自然界的最高立法必须是在我们心中，即在我们的理智中”，“理智的（先天）法则不是理智从自然界得来的，而是理智给自然界规定的”。^② 理性不仅为自然界立法，而且为道德立法，“纯粹理性只是自为地实践的，并且给予（人）一条我们称为道德法则的普遍法则”^③。理性是世界的法官，所有一切东西都必须在理性面前接受审判。康德的这个思想，充分表明了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对理性的崇拜。康德认为，人类完全可以凭借理性之光、凭借科学技术的力量，彻底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甚至可以像上帝那样无所畏惧、无所不能地创造世界：“给我物质，我就用它造出一个宇宙来！”^④ 在对道德责任的探究中，康德还提出了“人是目的”的响亮命题。他指出：“你的行动，要把你本已中的人，和其他本已中的人，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⑤ “人是目的”这一命题的提出，最深刻地表达了人的价值和尊严，从而构成了现代性有关人的主体性的最光辉、最经典的论述。^⑥ 康德虽然在他的三大批判中把理性概念分为不同的环节，提出了“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审美理性”这三大基本概念，并为它们奠定了各自的基础，但这三种理性从根本上说仍不过是一种纯粹理性，具有先验性和理想主义的特点。康德的三大批判实际上只是纯粹理性在认识、道德、审美领域的应用和规定。虽然康德否定了人们对事物加以理性认识的可能性，但他认为理性可以应用于实践领域。然而，康德的实践理性并不是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的理性，而是道德、意志、伦理上的实践理性。由于他的“绝对命令”仅仅是一种没有任何经验内容的形式上的道德规定，所以他的实践理性不可避免地具有先验性和理想主义的特点，是一种“应当”，与现实没有直接关系。这种离开现实的实践理性规定是空洞的、抽象的、理想主义的，在现实中也是很难行得通的。

① [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第353页。

② [德]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78，第92~93页。

③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32~33页。

④ [德]康德：《宇宙发展史概论》，上海外国语大学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第15页。

⑤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81页。

⑥ 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55页。

费希特不满意康德对分裂的理性的形式上的同一，试图以自我来克服康德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分离，他认为无论是理论理性还是实践理性都不过是绝对自我的活动能力。而且，费希特比康德更进一步，明确地把理性规定为他整个形而上学体系的出发点。费希特的“自我”就是一个理性实体、本体，它统摄一切，派生一切，“自我”不仅设定“自我”本身，而且设定“非我”，设定二者的统一。在康德那里，理性是受到限制的，它没有内容的规定，仅有形式的规定。而在费希特那里，理性的“自我”不仅具有形式的规定，而且具有内容的规定，不过它的内容只是纯粹的自我意识。另外，在康德那里，理性由于应用于认识领域将导致二律背反，这使得认识和实践割裂开来。而在费希特那里，认识和实践则是统一的。虽然康德和费希特在理性思想上似乎差异很大，但实质上是一致的，二者都是从理性出发，以理性来建构、统摄、批判、否定现实，把先验的理性当作判断现实的原则，以应当来裁剪现实，而不注重现实和研究现有本身。费希特的“自我哲学”可以说是对主体第一性原则的彻底贯彻，它反映了理性在现代社会的膨胀心态。

在柏林大学时期，马克思在研究罗马法的基础上，试图运用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性建构现实的方法来建立自己的法哲学体系，结果却以失败而告终。虽然马克思建立法哲学体系的这部分手稿没有保存下来，但从马克思给他父亲的信中可以略窥其法哲学体系的轮廓。在构建法哲学体系的过程中，马克思把一般的形而上学原理作为导言，然后体系的第一部分是法的形而上学，第二部分是法哲学，研究罗马法的思想发展。显然，这里采用的是理想主义的理性视角，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从“形而上学原理”出发，进行先验地演绎；不是根据法在现实中的发展来建立体系，而是从“应当”的理性出发，推理、论证整个体系。这就注定了马克思法哲学体系失败的命运。马克思在信中总结了失败的原因：“这里首先出现的严重障碍同样是现有之物和应有之物的对立，这种对立是理想主义所固有的，是随后产生的无可救药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最初我搞的是我慨然称之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这一切都是按费希特的那一套，只不过我的东西比他的更现代，内容更空洞而已。”^① 马克思认为，他在这里是用形式来裁剪对象、统一对象，而没有从对象本身的发展上来研究对象，没有看到事物本身的理性是作为矛盾展开并在发展中自身求得统一的。在法哲学中，马克思区分了形式法和实体法，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7~8页。

像康德那样，把形式放在重要的位置，“认为形式是概念形成的必要结构，而实体是概念形成的必要品质”。马克思承认，他在第二部分中所犯的错误在于，“认为实体与形式可以而且必须互不相干地发展，结果我所得到的不是实在的形式，而是一个带抽屉的书桌，而抽屉后来又被我装上了沙子”^①。他为了迎合这种理性推理，对众多的材料进行了肤浅和表面的划分后，把概念硬塞进体系之中，随便乱用，致使法的精神和真理全都消失了。“在实体的私法的结尾部分，我看到了整体的虚假，这个整体的基本纲目接近于康德的纲目，而阐述起来却大相径庭。”^② 很显然，正是由于这种康德和费希特式的理性视角，即从应当出发，而不是从现实出发，使得马克思的法哲学体系只注重内容空洞的原则、思维、定义，以及脱离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实际形式，从而使他不可避免地走进了死胡同。

法哲学体系建构的失败使马克思意识到康德和费希特理性思想的缺陷，必须抛弃康德和费希特式的“在太空遨游，寻找一个遥远的未知国度”，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观念，“真正地领悟在街头巷尾遇到的日常事物”^③，从事物本身的内在矛盾来解释其发展和丰富性，而不是以丰富的内容迎合抽象的形式。马克思指出：“在这里，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而决不允许任意划分；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中求得自己的统一。”^④ 然而，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所转向的现实并不是真正的现实本身，而是关于现实本身的思想，即黑格尔哲学。从1837年开始，马克思深入细致地阅读了黑格尔的全部著作及其弟子的大部分著作，并很快地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活跃分子。

“黑格尔是第一位清楚地阐释现代概念的哲学家”，“是使现代脱离外在于它的历史的规范影响这个过程并升格为哲学问题的第一人”。^⑤ 黑格尔明确指出：“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⑥ 这个“新的时代”（neue Zeit）就是“现代”（moderne Zeit），大致开始于1500年，以新大陆的发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标志。黑格尔在现代性问题上有两个深刻的洞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1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3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8页。

⑤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04，第5、19页。

⑥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96，第6~7页。

第一，黑格尔在深刻分析现代性本质的基础上，揭示了超越现代性的主体原则的重要性。黑格尔认为：“现代世界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其原则的，这就是说，存在于精神整体中的一切本质的方面，都在发展过程中达到它们的权利的。”^① 所以，“主体的特殊性的权力，他的满足权，或者换句话说，主体自由的权力，是划分古代和现代的转折点和中心点”^②。一方面，黑格尔指出，自由是理性的本质和追求的目标，“人就是自由意志”^③，自由是人作为自在自为的存在与其他存在区别开来的本质。另一方面，在黑格尔看来，“主体性”只是一个片面的原则。这条原则尽管绝对能够塑造出自由的主体和进行反思，并削弱迄今为止宗教所发挥的绝对的一体化力量，但它并不能利用理性来复兴宗教的一体化力量。^④ 所以，主体性原则既体现了现代世界的优越性，也体现了现代性的危机，充分表明现代世界是一个进步与异化共存的世界。黑格尔认为，为了避免主体性的危机，还必须以绝对的理性来超越主体性。在黑格尔看来，理性世界的本质，“除了理性之外更没有什么现实的东西，理性是绝对的力量”^⑤。绝对精神是理性的化身，它把自己外化为现实的世界，现实的世界只是理性发展的各个阶段，事物在其自身运动中不断丰富其完满性。在这种辩证的运动中，绝对理性能够扬弃自然与精神、主观性与客观性、感性与知性、知性与理性、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判断力与想象力、自我与非我、有限与无限、知识与信仰的片面性与对立。所以，理性不可能像康德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一种应当，“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当然，黑格尔所说的扬弃，并不是在现实实践中的扬弃，而是在概念运动中的扬弃。但是，这里所包含的辩证法思想，却为马克思后来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所发挥。主体性原则是启蒙理性的根基，黑格尟能够把现代社会的种种危机归结到主体性原则，这充分表明了其思想的深刻性，也充分表明了其批判现代性的态度。

第二，黑格尔触及了市民社会的基础作用、矛盾。黑格尔十分敏锐地看到了市民社会是现代社会各种矛盾的焦点。他指出，所谓市民社会，“这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因而也就是形式普遍性的联合，这种联

① [德]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第291页。

② 转引自〔美〕大卫·库尔珀《纯粹现代性批判——黑格尔、海德格尔及其以后》，臧佩洪译，商务印书馆，2004，第48页。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126～127页。

③ [德]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第53页。

④ 参见〔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04，第24页。

⑤ [德]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3，第294页。

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通过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①。在他看来，市民社会内在地包含着矛盾。一方面，“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另一方面，每个人欲望、需要的实现又必须依赖于他人，“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②。所以，如何解决个体自身的自由、特殊利益和他人、社会的自由、利益的矛盾，这是现代社会必须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黑格尔明确地指出了市民社会的辩证法所导致的对内压制、对外扩张现象。他说，随着“财富的积累增长”，“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匮乏，也愈益增长”。^③ 另外，“市民社会的这种辩证法，把它——首先是这个特定的社会——推出于自身之外，而向外方的其它民族去寻求消费者，从而寻求必需的生活资料”^④。“市民社会将被驱使建立殖民地。”^⑤ 但是，在谈到如何解决市民社会的矛盾问题时，黑格尔寄希望于体现绝对理性的国家。他认为，国家作为普遍伦理的代表，能够超越市民社会的特殊性。黑格尔的这个观点，就他强调以普遍伦理来抑制特殊利益来说，无疑有合理之处。但是，他把希望寄托于国家自上而下的调节、调和，无疑是保守的。但是，无论如何，对市民社会的深刻把握无疑给马克思以很大的启发。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矛盾及其根源的分析正是以市民社会为突破口的。

总的来说，“理性的概念是黑格尔哲学的核心”^⑥。世界应该体现理性的本质、实现自由，这是马克思所接受的黑格尔理性主义的最基本观点。

（二）博士论文时期：对自我意识和自由的宣扬

在 1839 年到 1940 年间，因为受黑格尔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而崇尚自由，马克思对古希腊晚期弘扬自我意识的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论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试图从中挖掘出变革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源泉。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他在 1841 年以《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为题撰写了博士论文。1839 年至 1841 年是马克思

^① [德]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 174 页。

^② [德]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 197 页。

^③ [德]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 244 页。

^④ [德]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 246 页。

^⑤ [德]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 247 页。

^⑥ [美] 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第 20 页。

的博士论文准备时期和写作时期，也可以说是马克思接受黑格尔现代性思想，初步表达自己的战斗精神的时期。

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马克思指出：“当我们承认自然是有理性的时候，我们对它的依附关系就不复存在。自然对我们的意识来说，不再是恐惧的来源，而正是伊壁鸠鲁使直接的意识形态、自为存在成为一种自然的形态。只有当自然被认为完全摆脱了自觉的理性，本身被看作是理性的时候，它才完全成为理性的财产。对自然的任何关系本身同时也就是自然的异化。”^① 在马克思看来，在伊壁鸠鲁那里，存在的一般形态表现为原子和原子群体，而自然、神、人则是存在的更高级的形态，是对存在的更高的、更进一步的规定；自然的本质就是现实的自我意识的本质。理性和世界并不是异在的、外在的、依附的关系，理性的实质就是自由，这种本质内在于事物，而不是外在强加于事物的。

黑格尔曾指出：“自由是意志的根本规定，正如重量是物体的根本规定一样。……自由的东西就是意志。意志而没有自由，只是一句空话。”^②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根据黑格尔的自由思想，对自我意识和伊壁鸠鲁关于原子偏斜运动的规定大加赞赏，认为自我意识的本质规定性就是理性、自由，原子的偏斜运动正是理性、自由的一种表现。通过与伊壁鸠鲁自由伦理的对比，马克思批判了德谟克利特的机械决定论。马克思指出，原子发生偏斜运动是由于原子互相排斥造成的，而“排斥是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因此，它是同那种把自己看作是直接存在的东西、抽象个别的东西的自我意识相适应的”^③。伊壁鸠鲁还把“排斥”作了更具体的运用，认为“排斥”体现“在政治领域里，那就是契约，在社会领域里，那就是友谊，友谊被称赞为最崇高的东西”^④，因为契约、友谊让彼此互不伤害也不让双方遭受伤害，使彼此处于一种平等、友好的关系中，马克思对此也十分赞赏。

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哲学强调的是“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和自由，尽管这个自我意识只是在个别性的形式上来理解的”^⑤。原子“‘偏离直线’就是‘自由意志’”^⑥，原子的偏斜运动打破了命运、必然性的束缚，体现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173~174页。

②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11~1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3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121页。